

## 青未了

## 人文 齐鲁

以后在和他不断的接触交往中,感到他虽然身居要职,声名显赫,却谦虚谨慎,平易近人,始终以普通一员的身份出现。

## ■齐鲁人物

## 谦虚谨慎,平易近人

——苗得雨先生为人为文二三事

□ 邓撰相

看到苗得雨先生又有新作《沂蒙山,家乡的歌》问世,高兴之余,又想起与他交往的一些事情,不由得对他更加敬重与佩服。

1964年秋天,山东省作协组织王希坚、邱勋、曲延坤、莫西芬等作家与当时的临沂地区的几位业余作者到临沂写报告文学,反映当时蜚声内外的临沂稻改事迹。当时,我也忝列其中。

一天,我与《山东文学》的诗歌编辑莫西芬谈起我的一首小叙事诗被退回时,莫西芬看了退稿信,说:“这是老苗写的。”然后看了看诗,说:“这诗不错嘛,怎么退稿?我给老苗再退回去。”说着给苗得雨写了封信,让我寄给他。当时我虽然对莫西芬很感激,但想到苗得雨当时是山东省作协副主席,《山东文学》主编,不一定能听一个普通编辑的意见,为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作者不顾自己的身份,收回自己的决定。然而,想不到的是,不久,这首诗终于配上曲子在《山东文学》问世。(他还请当时的山东音协主席张凤良配了曲。)

这就是说,在这事上,他非但没有考虑有失自己的身份,反而礼贤下士,虚心采纳了下属的意见,还为这篇拙作锦上添花。由此可见,他处处想到的不是自己的面子,而是作者,是意见正确与否,是对别人的尊重,即使这意见来自自己的下属。后来,与莫西芬说起这事,莫西芬说:“老苗就是这么个人,从不摆架子。我们在他面前毫无顾忌。”

## ■民间记忆

## 打箔

冬日的暖阳下,一只只箔锤在他们手中不停地上下翻飞,眼花缭乱;一根根秫秸被他们打得服服帖帖,整整齐齐。

□ 周东升

“八月深秋,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……秋风苍凉,阳光很旺,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,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白云的紫红色影子……”这是莫言在其作品中对高粱的生动写照。每每看到这段文字,便不由得想起以前老家高粱晒红米的醉人景象,脑海中也时常浮现出村子里的那些老人们,在冬日的暖阳下熟练而紧张地忙碌着打箔的身影。

高粱,作为适应性极强的农作物,曾在南国北疆广泛种植。我们这一带常种两个品种:黄罗伞和海南岛。黄罗伞成熟后,穗头呈黄褐色,向四周均匀散着,如撑开的花伞;其秸秆挺拔,有两米多高,非常适合打箔。而海南岛尽管抗倒伏,穗头也红得像火一样热烈,但秸秆太矮,仅有一人多高,没法用来打箔,所以逐渐就被淘汰了。

中秋节前后砍了高粱,打掉沉甸甸的穗头,用碌碡碾轧出来,是摊煎饼和酿酒的主要原料;去米后的高粱秆,用麻线绑扎成炊帚或笤帚,既方便实用,



▲1990年5月,本文作者(右一)与苗得雨(右二)一起在海南参加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合影。

二

这事是上世纪80年代初,我听临沂的张恩娜说的。当时我们与她一起聚餐。她说这事时,十分激动,我们听了也感动不已。

张恩娜是临沂一位小有名气的女作家,曾担任临沂艺术馆馆长。文革后,艺术馆办了个文艺刊物《沂蒙文艺》,她当主编。创刊不久,她突发奇想,让苗得雨为刊物写篇稿子,以壮声威。可又想到他是位当红的著名诗人,又身兼数职,心又怯怯的,觉得成功的把握不大。唯一可以寄予希望的是他是沂蒙山区的人。于是,便斗胆将信寄了出去。

想不到的是,过了不久,苗得雨不仅为她寄来了稿子,还附了封热情洋溢的信。信中除对家乡办的这份刊物表示热烈祝贺外,还对办好刊物提了些希望与建议,并表示,自己会全力支持这份刊物,有什么事需他办的尽管说。最后说到自己这篇稿子是奉命之作,不知符合不符合要求,不好的地方,请

尽管修改。

张恩娜说:“当我看完这信之后,真是又高兴又激动,想不到,这么一位大诗人,又身居高位,能看得起我们山旮旯里办的这么个小刊物!”

更让张恩娜想不到的是,稿子寄来不久,苗得雨又来电话,说稿子中有一个地方说得不够充分,还应再做些补充,他随后会将修改稿寄来。张恩娜看了看他写来的稿子已经很不错了,不知要补充什么,修改哪里。

没过几天,接到了苗得雨寄来的修改稿。稿子又以他那充满方格的大字抄得工工整整。那时没电脑,没复印机,改一次稿子就要重抄一遍。稿子虽不长,三千多字,可对编务与行政业务缠身的他来说,是多大的负担啊!

几天后,苗得雨又来电话问张恩娜稿子收到没,有什么意见,然后又告诉她,有一个地方,“的”字要改为“地”字。

他真可谓认真到家了!这除了说明他严谨的文风外,再

一次说明了他的为人。

三

1976年春天,我应邀去济南参加《山东文学》举办的文学创作学习班。学习班在济南南郊解放军后勤部招待所。学习班主要是为即将复刊的《山东文学》准备稿子。苗得雨与编辑们除了作报告之外,就是辅导作者的创作。

吃饭在机关食堂。每次吃完之后,大家都将碗筷放到旁边的一个大铝盆里,然后,由服务员洗刷。这天,我吃饭较晚,等我拿着碗筷想放到盆里时,突然发现苗得雨正蹲在旁边,挽着袖子刷碗。一下一下刷得那么仔细,那么认真。我又惊异又感动——他怎么,怎么在这里刷起碗来了?这时,其他作者也来了,一起夺他手中的碗,劝他快别刷了,让我们来刷。可他听不,和我们一起来刷了起来,直到刷完。从这之后,大家吃完饭再不向大盆里一摆走之,而是自觉地洗碗刷锅。

之后,我又听人谈论苗主编早晨在厕所刷坐便器的事。这事给我和全体作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俗话说“见微而知著”,从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上,不足以看出一个人品德的高尚和修养吗?

以后在和他不断的接触交往中,感到他虽然身居要职,声名显赫,却谦虚谨慎,平易近人,始终以普通一员的身份出现。啊,这对于发一首小诗,出一篇小说就沾沾自喜的人来说,是多好的一面镜子啊!苗得雨同志在这里,以言传身教,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。

## ■老照片

四十年前  
去当兵

▲本文作者(左)与战友拍摄于1973年。

□ 孙贵颂

时间如流星一般,一眨眼的工夫,就过去了四十年,太快了。

那是1972年3月,我高中毕业。当时全国还在闹腾,不能继续求学了,只有回乡务农的唯一选择。

在农村,要想跳出农门,有三条路:一是招工。招工全凭走后门,而且“狼多肉少”,没有关系的连梦也别做;二是上大学。毕业后国家管分配,人也成了城市户口;三是当兵,混得好可能提干。对于我,前两条路都被堵得死死的,唯一的希望是去当兵。

到了年底,开始征兵了。可是当兵也很难。因为前一年出了林彪事件,“批林批孔”,已经停止征兵一年。这样到1972年底,兵源就积压了两年。而当兵是有年龄杠杠的,叫“适龄青年”。那些年龄偏大的人,都争着去,害怕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。我那年19周岁,在适龄青年中算是偏小的,而最为挠心的是家庭成分。我家是中农,中农从理论上讲是可以去当兵的,但概率小得可怜。

我去村支部书记家好几次,不断表白要去参加解放军、保卫祖国的决心。书记答应可以让我参加体检。体检是第一步,意味着给你跨入部队开了一道门缝。过了体检关,后面才能继续政审等工作。但支部书记又召开支委会,将村里去体检的八个人秘密排了一下顺序。部队要一名叫谁去,要两名叫谁去,依次排下去。后来我才知道,他们把我排在最后一名。

体检结束,合格的有五人,有三人被挡在关外。接下来是政审。除我之外,其他四人全是贫下中农出身,根正苗红。然而这时命运之神眷顾了我。

去我们那里带兵的人,为首的是一个姓郑的指导员,在对体检合格者进行明察暗访时,与公社的团委干部、广播员等闲聊,她们恰好都是我的高中同学,郑指导员谈到我时,两位同学都说我很优秀。后来郑指导员又去我的母校了解情况。我在学校学习成绩突出,又是团员和班干部,经常参加学校宣传队,出黑板报,老师们对我印象很好,自然也都给我说好话。郑指导员暗暗记在心里。

到了部队,武装部和村里三方召开定兵会议时,他表示:这个村我们想要孙贵颂等三人。意见显然出乎村里人定的顺序。但这时我们村的支部书记做出了一个明智——对我来说简直就是英明的选择,他当即表态:同意孙贵颂去!

这一表态,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。

1972年12月底,我们坐车到烟台港,转乘大庆18号油轮。油轮没有客舱,只在甲板下面有些货舱、机器舱和锅炉舱等。我们坐进货舱里,虽然是冬天,但里面很闷热,穿一件衬衫还出汗。绝大部分人是第一次坐船,船摇来晃去,弄得人头昏脑涨。吃的是米饭,很干,许多人吃不习惯。菜是大锅菜,数量少,一会儿就吃光了。但我从小不挑食,不管好坏,只要能填饱肚皮就行。

两天后到达上海。四年之后,我在部队被提了干。

